

人性透视与历史的深度反思

——论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

王春林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对残酷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塑造了何金山、何秀梅等一系列具有骡子特点和人性深度的艺术形象,小说叙事独具特色、结构宏大,是当下时代一部少见的具有史诗性特点的优秀历史长篇小说。

[关键词]何顿;《湖南骡子》;人性透视;历史反思;叙事视点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3-0013-07

Deep 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n Novel of Hunan Mule by He Dun

WANG Chun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of Hunan Mule by He Dun, shows deep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of the brutal war and shapes a series of mule features and human depth of the artistic image, like He Jinshan and He Xiumei. It is regard as the current era of a rare epic nature of the outstanding historical novel with its narrative unique, grand structure.

Key words: He Dun; "Hunan Mule"; huma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reflection;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2011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若干部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长篇小说。无论是王安忆的《天香》,还是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抑或是方方的《武昌城》,都属于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如果说以上几位均是中国文坛成名已久的小说大家,是所谓的文坛耆宿;那么,在这一年里,同样以历史长篇小说的写作而令人瞩目的湖南作家何顿,就多少带有一点新面孔的“新鲜”意味了。说何顿是“新”面孔,其实带有明显的冒险意味。原因在于,早在写作《湖南骡子》之前,何顿已经有大量的小说作品曾发表在《收获》《花城》等大刊上,在文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主要关注表现市民生活的小说,一方面突出地显示了何顿

超强的写实功力,凸显了他标志性的个人艺术风格,但在另一方面,或许是受制于思想高度局限的缘故,却始终未能臻于中国当下时代小说创作的一流水准,因而,也一直未能得到文学界的充分关注。但是,到了这部《湖南骡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当中,当作家把他自己的关注视野由当下的市民生活转向消逝已久的厚重历史,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湖南为根本依托,对于长达百年之久的20世纪中国历史进行挖掘表现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对于自己的一种思想艺术的超越,并因此而引发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何顿是一个“新”面孔,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12-01-18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男,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从叙事时间来看,《湖南骡子》是一部跨度达一个多世纪的具有突出史诗性色彩的长篇小说。小说中那位贯穿始终的人物奶奶的年龄,居然长达110多岁。出现在何顿笔端的,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长达百多年之久的形象生动复杂异常的近现代史。无论是对于残酷战争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还是对于一系列具有骡子特点、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抑或还是对于复杂小说结构的特别设定,都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一部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长篇小说,别的且不说,单就其对于历史生活所进行的深度反思而言,《湖南骡子》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是一部具有年度标高意味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湖南骡子”这一标题名的选择,恐怕就多少显得有点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小说所讲述的故事,确实发生在湖南这个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内,作家笔端的那些别具神采的人物形象身上,也的确显示出了某种湖南人特有的“骡子”性格,诚如编者在封底的概括:“北方称人为骡子,多作笑骂。湖湘之地却不同,‘杂种’之意尽弃,只取力大耐劳,犟韧不屈,认定一条道、不撞南墙不回头、乃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之精神。‘骡子’成了美誉和昵称。中国现当代史,没有‘湖南骡子’,肯定是另外一种写法。”很显然,何顿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这部小说命名为“湖南骡子”,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感觉,何顿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表现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位置和作用,绝不仅仅具有区域史的意义。通过一个五世同堂的家族的曲折命运展示,对于长达百多年之久的堪称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深入的反思性书写,恐怕才应该被看作是何顿的根本创作动机所在。从这一点来看,“湖南骡子”这一命名,就多少显得有点自我局限,不够大气淋漓了。这样的一种命名方式,以一种区域史的方式对读者产生强烈的误导作用。关于这一点,只要和贾平凹的《古炉》略作比较,就可立见高下。照常理说,贾平凹笔下的“古炉”只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其地理范畴较之于“湖南”要小了许多。但因为“古炉”带有相当的虚拟性色彩,完全可以被指认为是北中国的任何一个普通乡村,因之,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一种象

征。而何顿的“湖南”,尽管比“古炉”村大了许多,但却是一个典型的实指性地理概念。哪怕是在艺术的意义上,“湖南”也只是“湖南”,只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很难成为中国的象征。从根本上说,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已然成为了一种普遍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式。极端一点说,舍弃了象征,艺术便没有了自己的存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何顿的“湖南骡子”这一小说命名确实有可商榷之处。

然而,小说的命名问题却并不能遮挡小说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光芒。尽管说何顿关于“湖南骡子”的命名确有不尽如人意处,但作家在小说中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场景所进行的深度思考与表现,却依然给我辈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尽管小说的故事时间长达百多年之久,尽管后半半个世纪也的确属于远离了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但就我们的一种阅读直感,《湖南骡子》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恐怕还是前半部分关于战争的描写与反思。在这里,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就是作家对于抗战尤其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进行了颇富新意的深入探究与表现。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些年来,伴随着历史史料的挖掘与发现,曾经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开始逐渐地得到了一种史学意义上的还原。虽然说共产党也同样在抗战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相比较而言,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国民党,是所谓的国军将士。然而,虽然史学界已经在尽可能地还原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但就文学界的表现而言,在这一方面却始终处于非常滞后的一种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何顿的这部《湖南骡子》,就完全可以被看做是第一部全方位整体性地再现国军惨烈的抗战情景、真实还原抗战历史的长篇小说。自然,这其中最为精彩的,肯定莫过于4次长沙会战的描写。虽然说迫于日军的优势兵力,其中的第4次会战以国军的失败撤退而告终,但前3次会战国军的胜利却是毫无疑问的。长沙会战,对于气焰特别嚣张、自以为不可一世的日军,形成了沉重的打击,彻底地打破消解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日军眼里,湖南是一块坚硬的土地,怎么啃

也吃不下，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和湖北，只一年就都吃下了，有的城市只一仗就吃下了，一吃下就占领了。湖南在日军眼里非常棘手，湖南人相当勇敢和顽强，一个小小的长沙怎么打也没打下，常德会战动用那么多武器和兵力，打下又丢了。日军里就有人提出‘要灭中国，先灭湖南’的方针。”在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军将士们，为什么会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得如此勇敢呢？对于这一点，作家何顿借用“我”爹何金山回答杨福全提问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区别很大啊，这也是我军溃败和共军节节胜利的原因，因为共军的士兵各个脑袋里都装着理想、装着杀富济贫，打仗敢玩命，一心要消灭我军，好早日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官兵却凝聚不起来，因为我们不是为理想而打仗。打日本鬼子时，我们同仇敌忾，就有凝聚力，敢玩命，战斗力就强。我这些天总是想，为什么一与共军作战我军就溃不成军？就几十万军队又几十万军队地被共军歼灭？这是我军官兵没有理想，不知道为谁打仗，就不愿打仗，而上头却不停地催我军打仗，这就丧失了当年打日本鬼子时的那股锐气，这是关键。”在这里，何顿一方面说明了长沙会战之所以能够对于日军形成沉重打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对比性地分析了国军最后惨败的原因。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思路，也就为“我”爹他们后来的和平起义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说到对于战争的描写与表现，《湖南骡子》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并不仅仅是对于国军将士真实抗战情形的还原性呈现，而是作家在“我”爹何金山这个人物身上所深刻寄寓着的一种差不多可以称之为反战思想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尽管从其人生经历来看，父亲的前半生可以说都是在血雨纷飞的战场上度过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却在于，如此一位半生军旅生涯的将军，在骨子里居然是一位带有强烈厌战情绪的反战主义者。这一点，早在抗战之前，就已经凸显无疑了。在赵振武师长因为内战而不幸身亡之后，父亲终于下定了当逃兵的决心：“‘懦夫、杀人犯，放着日本侵略军不打，却命令我们打红军。老子不干了。’爹一旦做出这种决定，就马上留意出出进进的人和车了，心里就荡漾着逃跑的快乐。”一位已经官至团长的军人，宁愿

做一名老兵饭店的老板，也不愿意继续自己的军旅生涯，而且还为此感到很快活。你说，这样的军人还不可以被看作是反战主义者么？说父亲何金山是一个反战主义者，还与他在战场上的一些反战言论有关。“李文彬有三个团，却让我爹的三团打头阵，爹最反感这种只考虑自己、自私自利的上司，忙对他的营长说：‘李文彬让我们团驻扎在山道口，要我们团与共匪死拼，你们听着，别把命都拼丢了，这里可没有人给你收尸。’三个营长都明白我爹所指地答道：‘我们懂’。”这是在抗战前。即使是在抗战的过程中，父亲何金山也有过类似的言论：“武汉会战在即，弟兄们，你们都是好青年，杀敌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被敌人杀死，你们在战场上都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成为日本鬼子的枪靶子。”“爹是普通人，也有私心，他见打仗勇敢且脑子活跃的李文军当了营长还带兵往前冲，便担心他看着长大的李文军万一有个闪失什么的，因为战场上阵亡的除了众多士兵，死的都是排长、连长和营长。……爹对李文军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抢功，更不要逞勇。’李文军团长点头道：‘师长，知道了。’爹对李文军挥下手，‘去吧，坚守阵地，不要让你的官兵冲锋，免得被日本鬼子当鸭子打。’”一位半生行伍的军人，可以把自己战士的生命看得比所谓战争的胜负重要得多，能够如此地珍惜生命，自然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反战意识了，尽管粗通文墨的父亲何金山自己也未必明白究竟什么叫做反战思想。

然而，尽管说能够通过父亲何金山这一军人形象地塑造传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反战思想，但如果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评价何顿在《湖南骡子》中对于战争所进行的反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与那些更具思想超越性的小说作品相比较，何顿的反思还是有一定缺憾的。比如说，同样是在2011年，我们读到了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用英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这是一部以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哈金那样一种显然已经超越了族际思维界限的思想深度。虽然说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绝对是日本军队，但作家哈金在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却并没有如同绝大部分作家一样，简单地以一种中日之间二元对立的方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进行小说叙事。在这一方面,一个突出的叙事标志,就是对于日本军人的称呼问题。在《南京安魂曲》中,对于日本军人或者称作“日本人”,或者称作“日本兵”,一直没有出现过如同“日本鬼子”这样带有强烈否定色彩的语汇。但是,在《湖南骡子》中,却一再地出现诸如“日本鬼子”这样的说法。不仅如此,联系全篇,我们还不难发现,某种意义上,国军抗战的问题,实际上一直贯穿在小说文本之中。比如,在1949年之后,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何金山都会因为自己投诚军人的身份而受到牵连。在此情形之下,他曾经的光荣抗战历史之受到压抑,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惟其如此,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才会有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原国民党湖南整编第一军将士们的自发聚会。此外,小说的开头之所以要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写起,小说的结尾处之特别强调20世纪的80年代“我爹、我大哥和李文军、贺新武、姜小工、陈万山他们,一群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的老兵”去专门参观长沙第一栋十几层的高楼,事实上也都在强化着对于抗战的表现在《湖南骡子》中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与《南京安魂曲》这样的小说相比较,何顿《湖南骡子》唯一的缺憾,恐怕就是没有能够在一种更高的人文观点上,超越族际思维模式来理解看待抗日战争。而哈金之所以能够在他的《南京安魂曲》中做到这一点,恐怕与他特定的文化身份所导致的超越性艺术视野有着密切的联系。

尽管从更严格的思想艺术标准来衡量,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思想缺憾,但能够以逼真的写实手段成功地还原真实的抗战情景,有效地为国军将士正名,确实应该被看作是何顿《湖南骡子》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大成就。但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却是,何顿究竟采取怎样的一种叙事策略才有效地取得了如此突出的一种艺术效果。在这里,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作家对于叙事重心的睿智设定。《湖南骡子》采用的,是具有相当叙事难度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何氏家族这个大家族的第3代成员,他不仅叙述传达故事,而且也作为一位小说人物介入到了故事的进程之中。从基本的创作动机来看,通过“我”的视角,讲述长达百年之久的家族、国族历史,可以说是何顿最根本的一种

思想艺术追求。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乃是何氏家族的复杂构成。何氏家族不仅源远流长,从“我”的爷爷何湘汉起始,到“我”自己孙子辈的何娟、何懿,构成了所谓的“五世同堂”,而且,家庭成员的构成成分也相当复杂。既有父亲何金山这样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大叔何金江、二叔何金林、三叔何金石这样的共产党人。既有何家桃的丈夫郭铁城这样的右派分子,也有何陕北、何白玉这样的“文革”造反派。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多多少少在何氏家族这里留下过自己的痕迹。惟其如此,一部家族史,才可以被当做一部生动、具象的国族史来理解认识。杰姆逊早就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某种意义上,何顿的这部《湖南骡子》,正可以被看作是杰姆逊此种观点的恰切注脚。在这5代人中间,就出生的年龄而言,与抗战发生着密切关系的,实际上正是父亲何金山他们这一代人。父亲一代共有兄弟4人,尽管其中老二、老三以及老四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共产党也确实以游击战的方式积极地介入到了抗战的过程之中,但必须注意的却是,叙述者“我”的视点一直都集中聚焦在自己的父亲何金山身上。这就正如戏剧舞台上的追光一样,由于叙述者的目光自始至终都追随着国军的高级将领何金山,所以,小说所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自然就是国军一部壮烈无比的抗战史了。说实在话,在意识形态禁锢依然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何顿能够以如此一种巧妙的叙述视点设定方式成功地还原展示一部真实的抗战历史,不仅需要具有相当的勇气和胆识,更需要具备一种特别的艺术智慧。在小说艺术形式的层面上,何顿的《湖南骡子》以其鲜活的文本事实鞭辟有力地告诉我们,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叙事视点的选择该有多么重要。道理实际上也非常简单,“十七年”期间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极其有效地“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2],能够有效地“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

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3],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作家的叙事视点自始至终都聚焦在共产党人,聚焦在了革命者的身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何顿这部《湖南骡子》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就是通过抗战过程中国军将士浴血奋战坚决抗日史实的还原,相对于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革命历史小说,实现了某种思想艺术的可贵超越。

如上所述,《湖南骡子》确实是一部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表现的长篇小说,但如果仅仅由此而把《湖南骡子》看作是一部战争小说,却又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湖南骡子》只有前半部可以被看作是战争小说,因为这个部分自始至终都是在围绕父亲何金山的行伍生涯而展开叙事。到了小说后半部,小说的叙述重心,自然而然地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化,由对于战争的展示转向了对于何氏家族和平时代日常生活的展示与描写。事实上,也只有把这两个部分整合在一起,《湖南骡子》才可以被视为一部生动具象地展示表现了长达百多年近现代家族史与国族史的优秀长篇小说。在阅读《湖南骡子》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苦苦思索,何顿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艺术表现视野拉长到长达一百多年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很显然,假若何顿仅仅停留在小说前半部对于战争生活的书写表现上,真实地再现一部抗战的历史图景,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艺术选择。同样,也可以构成一部叙事元素相对完整的长篇小说。但,何顿为什么一定要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叙事时空呢?原因之一,当然在于何顿要为如同父亲何金山这样的国军将士们“鸣不平”。“我爹他们这样的人在当年那种高压政治控制的社会里,活得很扭曲,也活得很顽强,他们就像角落里的蒺藜,尽管不被阳光照耀,仍然孤独、凄凉地不声不响地活着。”很显然,假若缺失了小说后半部关于父亲他们一干曾经浴血抗战的前国军将士们充满屈辱意味的生存状态的真切描写,那么,不仅父亲何金山他们人生的悲剧意味无法获得充分的展示,而且,何顿对于既往中国历史进行深度反思的创作题旨也同样无法得到很好的艺术体现。除此之外,何顿之所以一定要把小说的叙事时间延展到当下时代,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何顿试图以一种具有长河式小

说规模的艺术方式,全方位、立体性地呈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状貌,尽管说如此一种艺术目标的实现未必会那么圆满。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一点却是,作为一部厚重的历史长篇小说,其透视表现人性深度,进而刻画塑造成功人物形象的艺术追求,正是依托于小说后半部的存在才得以完成的。

说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湖南骡子》这部长河小说里,诸如何金山、何金江、奶奶、何家桃、大哥、李雁城、李文华、马秋燕、付琳等人物形象,可以说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相比较而言,最能够体现所谓湖南人的“骡子”性格,同时也最具有精神分析学深度的一位人物形象,却是何秀梅这样一位悲剧意味特别强烈的女性形象。作为国军高级将领的女儿,打小就接受良好教育的何秀梅,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在内心里深深地喜欢上了同样身为国军军官的李文华。然而,李文华内心里喜欢着的,却是她的同胞姐姐何家桃。为此,何秀梅幼小的心灵世界一度饱受煎熬,以至于在回答奶奶的一次问话时,曾经说出过“我不嫁人”的话语。谁知道,眼看着就要和李文华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何家桃的情感世界却突然发生了强烈的倾斜,拼死拼活都要嫁给偶然相识的资本家公子郭铁城。照常理说,既然何家桃退出了感情的竞争,既然何秀梅真心真意地深爱着李文华,那么,何秀梅与李文华顺理成章地就应该摘取甜美爱情的果实。但正可谓“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何秀梅居然被一伙兵痞给轮奸了。这样一种不期而遇的灾难,不仅深深地伤害了何秀梅的肉体,尤为严重的,更是对于她精神世界的扭曲。尽管一度自杀未遂,但何秀梅从此之后却再也没有能够走出这一偶发事件对自己所形成的巨大精神阴影。从此之后,何秀梅就把自己的心灵世界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何秀梅自己都记不清那几年拒绝了多少男人求爱,没有一个排,至少也有一个班吧?这几个是她记得的,青山街上那个从槐树后跳出来的青年是她的小学同学,另两个是她的同事,还有几个是她不屑于去记的,因为她连眼角的余光也不会放到那几个男人身上。”不要说其他男性,即使是面对着自己深爱着的李文华,何秀梅也无法走出心灵世界的障碍:“何秀梅有苦说不出,她也不想说。何秀梅有一

颗金子般的心,还有一颗诚实的脑袋。她尽管胆子大,人猛,有热情,工作很努力,敢于挑战世人的目光,甚至在众人面前她是个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当代女性,骨子里她却是这个世界里最传统、最保守和最自卑的女人。她的内心极其脆弱,脆弱得像一颗生长在阴影里的小苗,没有阳光照耀,也不曾被雨露滋润,靠一点地下水分维持生命。在她金子般的心里,她觉得如果要她跟李文华结婚,她就有责任把发生在她身上、令她悲伤的事原原本本告诉李文华。但她又觉得假如她和盘托出,她在李文华面前从此就失去了光泽就再也抬不起头了,而不告诉李文华,她又为自己隐瞒了这段‘污迹’而深感对不起李文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深的怪圈。这个怪圈如一头猛兽样撕咬着她,让她想逃避现实。”就这样,尽管内心里深爱着李文华,但何秀梅就是无法战胜自己,无法走出那个事件对她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以至于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文华和自己的堂妹何军华一起步入了婚姻殿堂。

很显然,何秀梅的这种固执就是湖南人那种典型的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性格的形象体现。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那样一个身体被侵害事件的发生,就在何秀梅的精神世界打了一个就连她自己都无法解开的死结。何秀梅的人生悲剧,乃是如此一种精神情结作祟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何秀梅,小说中还特别地描写到了她对于自己的侄孙女何娟的悉心关爱:“一向孤傲和自私的何秀梅,其实也有母爱,虽然她没做过母亲,但她身上的母爱被何娟诱发了。何娟活活就是一枚糖衣炮弹,把她姑奶奶那颗坚硬如铁的心彻底融化了。”甚至于,在何娟的感召之下,何秀梅忽然意识到了孤傲的自己多年来对于母亲的忽略,曾经大老远地跑到何家山去看望母亲。正因为何秀梅被过分压抑的情感始终找不到恰当的出口,所以,才会以一种类似于力比多转移的方式体现在她的侄孙女何娟身上。然而,我们从她总是要给何娟讲述穆桂英与花木兰这样一类女中豪杰故事的行为中,还是能够感觉得到那种精神情结的顽固存在。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前面已经探讨过的小说标题问题上。根据封底的说明,所谓

“湖南骡子”,意指一种“力大耐劳,犟韧不屈,认定一条道、不撞南墙不回头、乃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湖南地域精神。按照此种逻辑,既然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湖南人,既然湖南人都应该具备“骡子”性格,这样,何顿实际上就给自己出了一个极大的艺术难题,那就是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够把这些不同的“骡子”性格区别开来。道理其实也非常简单,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最忌讳的一点,就是人物性格的雷同。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来看,何顿笔下的人物从总体上说还算是达到了相当的个性化程度。一方面都要体现所谓的“骡子”性格,另一方面却又要充分地个性化。以上两种艺术要求,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我们之所以认为何顿“湖南骡子”这一小说命名存在一定的问题,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艺术难度,不能说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何秀梅的形象塑造之外,小说中何陕北与何白玉这两个人物形象,也以其精神内涵的饶有新意而格外地引人注目。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两位人物形象的独具个性,就是因为我们在既往那些可以表现“文革”的小说作品中,几乎很少看到过这样一种类型的造反派形象。在新时期以来那些关于“文革”的小说中出现的造反派形象,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的家庭与亲情的背叛。具体到何陕北身上,就很可能是对于曾经身为副省长、后来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派的父亲何金林的背叛。具体到何白玉身上,同样很可能是对于曾经身为国军军长的爷爷何金山的背叛。但是,到了何顿的这部《湖南骡子》中,我们事实上所看到的何陕北与何白玉却是与此相比可谓大相径庭的两位造反派形象。他们不仅没有背叛自己的家庭和亲情,没有实行所谓的大义灭亲,反而一再想方设法地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来维护自己家庭的利益。比如何陕北,一旦成为所谓“红旗军”的领袖,首先想到的就是带领自己的部下去把被别的造反派组织关押批斗的父亲何金林抢救出来。只不过,因为老革命何金林党性极强,认为儿子的行为乃是胡闹而未遂,可怜如此一位为革命的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革命者,最终只能万般无奈地冤死狱中。比如何白玉,尽管过分喜好女色,但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自觉维护家族

的利益方面,这位造反派领袖的表现却也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在得知大姐何家桃一家乃是因为遭到李向东与刘股长他们的陷害而被打成右派的缘故之后,何白玉便想方设法替自己的大姑报了这个冤仇:“何白玉把肥胖的身体往沙发上一靠,看着对他一脸感激的郭香桃说:‘回去告诉你妈,那个把你爷爷打成右派的李向东书记,因贪污你爷爷上交的五块金砖,被枪毙了。’郭香桃眼睛一亮,兴奋地问:‘真的?’何白玉接着说:‘那个被褥厂保卫股的刘股长,也因贪污没收的金砖,畏罪自杀了。’何白玉觉得自己总算给大姑妈一家报了仇,脸上就惬意,‘还有,那个把你父亲打成右派的工会赵主席,被人打成了精神病,听说也死了。’”大义灭亲,固然是“文革”期间造反派的一种人生选择,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家族谋取一点利益,也未尝就不是造反派的一种选择。能够成功地塑造出如同何陕北与何白玉这样两位别具一格的造反派形象来,所充分凸显出的,当然是作家何顿一种突出的艺术创造力。

在行将结束此文之前,有两点不太满足,需要与作者何顿略作商榷。一是整部小说从头到尾读下来给人的一种艺术直感,就是细节、情节的密不透风。这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写得过满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写意画,应该可以给何顿以很好的艺术启示。设若充分地注意到小说细节与情节的疏密结合问题,那么,何顿《湖南骡子》所抵达的思想艺术境界,大约就会更加高远一些。二是小说的叙述节奏或

者说叙述与描写的结合问题。从总体上说,《湖南骡子》的叙述节奏存在着频率过快、过于紧张的问题,导致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作家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叙述与描写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并不只有何顿的写作存在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在当下时代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具体来说,就是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开始意识到小说从本质上是一种叙事文体起始,我们的作家就越来越重视叙事,而于有意无意之间便忽略了小说的描写。实际上,只要是经典的小说作品,其叙述与描写都达到了一种很好的艺术平衡。因此,我说寄希望于何顿,寄希望于中国作家的,就是能够在小说观念上充分地意识到描写的重要性,在小说叙事实践中能够很好地做到叙述与描写的艺术均衡。

参考文献:

- [1] 弗·杰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M]//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5.
- [2] 黄子平. 灰澜中的叙述[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
- [3]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6.

责任编辑:黄声波